

对话

北大法语系主任、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董强：

人文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日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主任董强当选为法国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综合学科”类终身通讯院士。作为 200 多年来首位进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的华人和最年轻的通讯院士,董强曾旅法 12 年,长期从事翻译工作,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中法文化交流的桥梁人物。

那么,他对我国高校在翻译人才培养和人文社科教育方面有着怎样的认识?西方又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董强。

培养翻译人才要有跨界思维

《中国科学报》:您是我国著名翻译家,还担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一职,那您觉得我国当前高校在翻译人才的培养方面存在哪些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何在?

董强:翻译家不是一个职业,总是依附在别的上面。比如傅雷,他本身是作家、评论家,写了《傅雷家书》。翻译是他所有行为中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体现他价值最好的一部分。但他整个人的知识体系并不是建立在翻译上的。在研究的过程中,他觉得是一本书好才翻译过来,这与专业知识相关。

翻译往往是由此带动的。国外有专门的翻译学校,但是那些学校并没有涌现出一个大翻译家。他们只是把语言当成了工具,所学的都是一些实用的翻译知识,进行各种口译、同声传译等,各种会议、商谈他们都能翻译,但是并没有一个人会给你翻译一本书。

所以,翻译就难在这儿。我国高校也如此,它是大的体制问题造就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解决翻译人才培养的关键问题应该是什么?

董强:我觉得,培养翻译人才要加强人文教育,要跨界,需要外语人才与人文教育的结合。

当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曾受到了很好的基础教育。比如,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客户才能,我们都可以去听。作为北大的那种人文气质,我们随时都能够享受到。

如今,要解决高校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就需要适当淡化专业化概念。如果学法语,就纯粹把它当作一种语言;或者学历史,就纯粹研究中国历史,这是远远不够的。再比如,现在过于强调

记者快评

留学,谁来补上『安全课』

■陈彬

近日,在第三届广州国际教育博览会期间,由 3000 多名准留学生、海外在读留学生和已毕业留学生参与的《2016 留学安全调查报告》发布。调查显示,大部分留学学生对在海外如何避免侵害,以及遇到安全威胁时该如何应对并不清楚。

具体而言,在发生校园枪击、恐怖袭击事件,或遭遇抢劫、绑架时,明确知道该如何应对的留学生只有约 20%。34.5%的留学生表示遇到安全威胁时不知道如何应对。56%的学生表示并没有掌握急救常识。

与此相对的是,仅在刚刚过去的 11 月,就发生了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持刀袭击事件,以及留学德国的中国女学生在德国遭遇性侵并被抢劫。今年夏天,美国芝加哥大学多名中国女留学生在校园内遭遇持枪抢劫……

随着国内学生出国人数的持续增多,留学生在国外的的人身安全问题也愈发显得重要。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便是——谁来为准留学生们补上安全这门课?

之所以用“补上”一词,是因为安全教育其实本应是贯穿于中小学乃至幼儿园教育始终的,但遗憾的是,长期的应试教育下,国内学校的安全教育开展始终不力,这也是中国学生在外频遭意外的重要原因。

鉴于当前留学安全教育普及度不高的问题,今年 5 月,教育部曾会同有关单位,连办了 80 场平安留学培训。这样的培训当然是需要的,但必须承认,80 场培训虽然不算少,但依然属于阶段性的行为。目前,作为学生出国留学的两个主要推动力量,高校和留学中介机构都没有建立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安全培训机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对于留学生安全教育的好坏并不影响学生留学本身的成败,即使不做也不影响“留学工作成绩”,哪怕学生因此在国外出现危险,相关机构也不会有任何连带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相关机构对留学生的安全教育动力自然不足。

因此,作为学生留学前最后“打交道”的机构,我们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对高校和留学机构的安全教育进行一定的引导和约束,甚至可以建立起相关的责任追究制度,只有在内外均有动力的情况下,对留学生的安全教育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国学,这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受到印度和西方的影响,这是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要培养翻译人才,一定要带有开放式的、跨界的思维。

人文社科“功夫在诗外”

《中国科学报》:既然您觉得培养翻译人才需要加强人文教育,那么您觉得目前人文教育有什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董强: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成立之初,还没有“人文社科”这个词。现在法兰西学院保持传统,一直没有改变名字。但是看里面的分类,包括历史、哲学、经济等,其实就是人文社科。

我在法国十多年,确实学到了人文社科知识。中国有句话叫“功夫在诗外”,是说一定要注重诗外的功夫。人文社科也是如此。

人文社科要有大的格局,一定要超出自己简单的专业知识。而且眼光越大,兴趣越广泛,了解的知识越多,越容易突破。越是在跨界的情况下,就越能够在人文社科方面出成果。

比如我的导师米兰·昆德拉,他为什么能够提出独一无二的小说理论?就是因为他将音乐和小说联系在了一起。在他之前,也曾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但是像他这样全方位地把音乐和文学创作从历史角度、结构角度、内容角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只有他一人。因此他跨界了,写出了《小说的艺术》。这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论著之一。

这也是我提倡多花些时间在艺术上的原因。我个人花在艺术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在文学上的时间。我一直创作书法,因为书法是中国精髓性的东西,它既是传统艺术,又是文字,同时也是图像,还很现代。书法带给我很多灵感和启发,现在在我的很多创作欲望也是来自书法。

学法语之后,我并没有把书法丢掉,甚至还举办过书法展。书法成了我交朋友的一个重要途径,很多艺术家看到我的书法后会想跟我交朋友。书法给我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也为我打开了很多渠道和领域。

我研究中法这么多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很多领域是相通的。而且越打通更多的领域,达到的成就就越高,走得也就更远。

总之,人文社科需要大的格局,从大处着眼,然后从各个细小的地方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这就需要跨界,需要各方面的知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方面的现状?

域外传真

工程师同样需要“科研型”

■理查德·弗洛雷斯

英国著名发明家詹姆斯·戴森爵士曾经说过:“工程师是能够为人类在 21 世纪面临的挑战——包括可持续发展、住房和人口老龄化创造实际解决方案的人。这样的人要多多益善。”我完全同意这种说法。

英国皇家工程院的分析表明,到 2020 年,英国需要超过一百万的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满足行业需求。企业、政府、教育部门和专业团体正在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工程师的人才问题。为此,英国许多企业和学校之间举办了联谊活动,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高教视点

“

人文社科要有大的格局,一定要超出自己简单的专业知识。而且,眼光越大,兴趣越广泛,了解的知识越多,越容易突破。越是在跨界的情况下,就越能够在人文社科方面出成果。

董强:中国在人文社科方面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因为我们的文史哲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核心。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延续中间出现了“断层”。

现代人文社科的奠基者都是西方人,读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绝大部分的经典著作都是西方人写的。在这种情况下,比较难做到的就是到底该如何面对西方在人文社科方面的位置。现在,我们有过度的国学化、自我民族化的趋势,这也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文社科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认为,现代人文社科要想再丰富,或者说达到一个新的高度,首先就要解决态度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面对西方在整个人文社科里的位置。否则,我们很可能每说一句话都要想一想,里面有多少成分是外国的,有多少成分是中国的,这样的话,学问就没法做了。

要把人文社科看成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经验是世界经验的一部分。世界经验可以解释中国经验,同时,中国经验也可以解释世界经验。只有这样,人文社科才可以上升到新的高度。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与西方的专家学者们交流。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自己的东西,或者只讲中国经验、中国故事,就会很难。不存在纯粹的中国故事,我们一定要参照一下西方。

共同创造工作实习和项目实践的机会。

尽管大学正在努力填补工业界的空白,但仍然存在着一一种风险,即忽视了我们自己的需求。我们真的是在尽最大努力去鼓励最有前途的工程毕业生成为未来的学术界权威吗?而这正是英国皇家工程院在最近一份关于工程毕业生从业方向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

这份报告显示,只有 3.2% 的英国工程毕业生会继续从事进一步的研究和学习工作。这个结果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喜闻乐见的,但对学术界不是,尽管这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他有望成为一个优秀研究人员的潜力,但当我问到他是否考虑读博士时,他回答说企业已经给他提供了工作,在他看来,能直接工作就再好不过了。

为什么我们吸引不了更好的学生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呢?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工程学本科生可以收到大量关于行业中潜在职业的信息和获得工作经验的机会,但是直到他们下定决心投入工作,我们也很难提供给他们体验研究的机会。

学生第一次接触到研究环境通常是在他们最后一年的项目中。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给他们提供在本科课程中进行研究的机会。以研究为基础的教学和基于探究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在大学本科课程中更早地接触到学术方法,与工程研



《中国科学报》: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属于法兰西五大学院之一。您如何看待中外人文社科的差距?西方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董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社科曾经一度非常辉煌。但是现在,它在全世界都遭遇到了危机,法国人文社科也不例外。不过,它是法国比较成熟的学科,各个领域已经出了无数的杰出人才,它肯定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借鉴的,那就是加强基础教育。人文社科需要比较全面的基础教育。就是在本科的时候,尽可能让学生接触学科领域内的经典著作,扎扎实实地了解这个学科是怎么来的,然后掌握这些知识。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我坚持中西要合璧,融合得越好,教出来的学生质量就会越高,因为世界需要参照,人文社科需要参照,不能纯粹地就事论事。

我们要鼓励学生多学一门外语,多接触一些经典的著作,并带到国内。德国有德国学派,法国有法国学派,美国有美国学派,这就已经是三门语言了。如果每个语言都会,在这种参照下,再把我们中国经验放进去,那就不一样了,就不再是纯粹的自说自话了。

人文社科教育需要世界视野,这非常重要。我们的实践和经验,在整个世界的参照之下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究人员进行互动以及了解他们的工作,也可以大大地提高学生进行学术研究的兴趣。

大学对提供给给学生一定的工作实践机会会感到自豪,但他们应该同样热衷于提供研究机会。

我们于 2014 年建设了英国谢菲尔德工程领导力学院,让本科生在学位早期阶段接触研究工作。我们每年批准最多 10 个研究助学金,学生需要完成为期 10 周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 3D 打印、核废料和碳纤维材料等领域。通过这样的研究,他们获得了更多可转移的技能来进入他们未来的职业——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工程行业。

在理想的世界里,实践和研究这两者是不会互相排斥的。我想看到更多的工程学博士进入工业工作,反之亦然。英国工程行业的最佳解决方案是培养理解研究工作的工程师以及具有行业经验的研究人员。更多工程毕业生选择学术研究将最终意味着工业的胜利。

但是,这需要改变高等教育的普遍文化,以便学术界能够留住那些更具有光明前景的年轻人。如果我们想要在工程行业 and 学术界都拥有最好的工程师,大学就需要从现在开始,积极促进研究工作,以此来作为向工程行业迈进的同样重要的第一步。

(作者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工程领导力学院院长,田思敏翻译)

■张婷妹

办大学无须理会“文字游戏”

了玩“文字游戏”。这些“游戏”使得高等教育界远离了平静,而剩下的唯有喧嚣。大学的各级领导辛辛苦苦地应付着名目繁多的检查、考评、评估和巡视,大学内的芸芸众生也为贯彻落实各种改革号令疲于奔命,这些似乎已成为大学的常态。那么,大学要如何办才能摆脱当前的困境而回归正常?要笔者说,办大学真的无须理会这些“文字游戏”的烦扰,抓住学术的根本,以静制动方为上策。

这就要求大学管理者要尽力为师生营造安静而自由的学术氛围,杜绝大学的学术在繁华中陷入平庸。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所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安静而自由才是教育应有的环境和氛围。大学应当尽量多地吸收那些有志于成为“学术建树者”的师生,鼓励他们秉持高迈志向,允许他们优雅

而自由地发呆,为学术知识的创新“养根俟实、加膏希光”。

这就要求大学在当代社会对大学日益增多的需求面前,仍要坚守以学术育人的使命。育人是大学的立身之本,“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的各项发展均要以育人为重,关注学生的发展需求和成长规律。为此,应立足于普遍价值的“通识教育”,帮助青年发展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因此而受益终生;为此,应大力发展教学学术,摒弃“注水式”的教育,实行“点火式”的教育。总之,要努力促使青年在离开学校时,成为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有教养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专家,甚至是有技术的野蛮人。

所幸的是,现实中不少大学已经认识到“文字游戏”的危害,为大学重返清静和自由做着

日前,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7 年度公务员(课程)录用考试公共科目笔试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47 个城市的 900 多个考点同时举行。据统计,本次考试共有 120 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申报 2.7 万个招录计划,有 148.63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13.7 万人缴费确认参加笔试,98.4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考率约为 86.58%,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比例约为 36:1。

其实每年公务员报考之后,都会有学生放弃缴费确认参加笔试。缴费确认之后,还会有人放弃参加考试。比如,2016 年度公务员招考,共有 139.5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106.9 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近 93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共 46 万人放弃;2015 年度公务员招考,先有 141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的资格审查,之后 105 万人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近 90 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共 51 万人放弃考试。而 2014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 152 万人通过招录机关资格审查,实际参加考试人数为 99 万,放弃人数为 53 万。

舆论普遍比较关注公务员报考人数,并以报考人数多少来分析公务员报考的冷热,却比较少关注公务员考试弃考现象本身。而公务员考试弃考现象更能说明公务员报考为何这么热。连续多年 50 万人规模左右的公务员考试弃考表明,有大批学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参加公务员考试报名的。这种心态折射出我国十分严峻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以及大学生就业缺乏理性规划。

在去和前年,舆论曾分析公务员报考降温,其理由是由于实行八项规定、反腐,导致公务员灰色收入减少、公务员岗位吸引力减弱,进而报考人数减少。很显然,这一分析仅仅看到表面,而没有分析具体实质——有多少是冲着灰色收入去报考公务员的?用这种逻辑如何解释今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又增加了呢?因为报考人数减少几万一就认为降温,这是很不理性的。

笔者并不认为当前我国公务员报考存在降温趋势。我国公务员报考为何一直高烧不退,其实与三方面因素有关,而这三方面因素一直没有消失,因此,公务员报考不可能在短期“降温”。

这三方面因素首先是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由于就业形势严峻,只要有工资待遇不错、比较稳定的工作岗位,都会有很多学生去投简历,大家所见的是大学毕业生到处赶场子参加招聘会,四处投简历。多年前有媒体调查,我国大学毕业生的简历浪费(漫无目的投简历)就达 20 亿份。那么多大学毕业生报考公务员,也是出于这种“有机会就不放过”的心理。

其次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选择面很窄,一直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存在地域集中、行业集中、岗位集中的问题,大学生追捧公务员岗位,就是行业、岗位集中的体现。而且在选择具体公务员岗位时,也存在进一步集中的问题,即关注中央、省一级的公务员岗位,而对县乡一级的公务员岗位不感兴趣。虽然很多人劝大学生选择有创新挑战的工作,可创新创业选择对大学生来说并不容易。

第三是大学生迫于就业形势,大多选择先就业、再择业(即不管喜不喜欢,先有一个岗位再说),加之追求初次就业率的高校,也催大学毕业生落实就业工作,不引导学生对择业进行理性规划,很多学生有“抓到篮子就是菜”的想法,这种想法虽然务实,但也有诸多问题,包括在求职过程中,只要有机会就“抓”住,随后有了新的机会就放弃前面这一机会,以及就业之后很快就对岗位不满意而选择跳槽。调查显示,毕业半年内跳槽的毕业生达到 30%。50 万考生放弃参加公务员考试,有相当多数就属于想先抓住机会,之后有新机会出现而放弃这种情况,他们并没有考虑好公务员岗位是否适合自己——不仅在报名确认时有放弃,在确认后参考时有放弃,在面试时还有放弃。

换言之,50 万考生放弃公务员考,凸显了相当一部分学生在就业季的迷茫,他们在报名时并没有想好自己要不要做公务员,只是把这作为一个机会而已。改变这种情况,需要给大学毕业生创造出更多有效的就业选择,同时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引导他们结合就业形势和个体的个性、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应该做到在就业中进行理性的择业规划,以增加对就业岗位的满意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公务员考试降温。

(作者系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五十万考生放弃国考说明什么

■熊丙奇

各种各样的努力。

比如,2016 年,清华大学为每位大一新生送上《瓦尔登湖》一书,希望同学们通过该书汲取到在宁静中“追问本心、坚守初心、笃学砥砺”的启发;笔者所在的南京理工大学校长付梦印也在 2016 级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深切地勉励同学们,要坚持梦想,以一颗责任心、进取心和平常心,学习师长们静心求索、追求卓越的学术精神,把自己打造成兼具“军工魂”和“创新志”的“杰出匠才”。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努力和尝试今后还会有很多。唯有重返清静和自由,不随外部“游戏”的变化而随波逐流,学术的高贵、学者的尊严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大学也才能真正进入一个自主的世界。

(作者系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